

大美陕西

六楼骑街

□ 秦延安

建筑形制，六楼楼又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用柱子支撑楼体，如文昌阁和星明楼；一类是将楼阁建在巨大的台基之上，如钟鼓楼等。虽然这些楼或高大、或巍峨、或精致、或典雅，但又各具特色，可谓是汇集了15世纪以来整个黄土高原的建筑技艺。而楼阁之间又有不同的牌坊，或木制或石建，都高大威武，古色古香。

我走访过全国的许多鼓楼，但当看到砖砌崇台、拱洞四通的老街鼓楼时，仍被它独特的建制吸引住了。鼓楼上南、北两侧的两座配殿，如四合院的耳房，众星捧月般守护着正中的两层重檐殿宇，形成布局严谨、层次分明的格局。那殿宇为歇山顶，上覆琉璃瓦，内有沥粉贴金；雕梁画栋，细腻雅净；飞檐翘角，灵动飘逸，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，气势非凡。

过了鼓楼便是以华美著称的凯歌楼。楼基为砖拱洞门，门前配有门楼，南北通达大街。青砖砌成的楼基四方规整，高达8米，稳重大气。上有两院二层木楼建筑，不管是镂空雕花的门窗，还是彩绘的祥云梁枋，都极其精致，寓意吉祥。两院各立旗杆一对，南院有牌楼一座。楼之四角均有钟鼓角楼，可以瞭望四方。相传旧时边塞战争结束时，往往在此举行祝捷、献俘、庆功等活动，故有“凯歌”之名传世。整个建筑既有明朝楼殿的形制，又有家宅的影子，让人称奇。

凯歌楼之后，是带有近代西洋建筑风格的钟楼。这座建于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的钟楼，融汇了中西方建筑艺术。楼基砖砌拱洞四通，由底及顶为三层，高24米、长20米、宽15米。其中底层为不规则六边形，上面两层为环形的西式建筑。我们从东侧的大门进入，过桥后拾阶登楼。只见

楼顶中心为木质重檐八角亭，内悬大钟，顶部滴答作响的钟表，似乎在讲述着时光的无情飞逝。门洞上方分别悬挂着“蜚英腾茂”“北临雁塞”“南控乌延”“芹水流芳”“驼峰拥翠”“蜚英腾茂”“万流仰镜”等石刻匾额，读来满是诗情与画意。整座建筑在继承中寻求着创新，在“拿来中”彰显着突破。

作为“六楼骑街”中颇有诗意之美的一座，星明楼的一梁一木皆是艺术。该楼建于明嘉靖年间，由28根柱子支撑起三层楼体，总高达20米，为全木质方形结构。楼的底层为四石基台座，每个石基上竖立7根巨柱。巨大的楼身和宽阔的殿宇皆靠这些柱子支撑。抬头仰望，斗拱层层叠加，额枋与檐枋环环相扣，设计精巧、造型独特，既起到支撑屋顶重量的作用，又形成繁复的装饰效果。在力学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中，折射出古人的高超技艺。悠长的岁月啃噬出了木柱的肌理，但它依然挺拔如初。梁枋上的彩绘经久弥新、色彩鲜明。楼前的石狮虽被风沙磨平了棱角，却仍保持着守护的姿态。置身其间，仿佛跨越历史长河，令人对昔日古城的繁华景象产生无限遐想。

此外，象征古城文脉的文昌阁、教化与人为善的万佛楼，在交相辉映中凸显出古城的古朴自然与厚重的历史底蕴。

在这些楼阁与牌坊之间，榆林小曲恰似莺燕啼鸣般婉转悠扬，大气雄浑的横山说书激昂地讲述着塞上风云，还有高亢的陕北民歌、龙腾虎跃的腰鼓、扭头摆尾的秧歌，以及剪纸、唢呐、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充斥其间，与羊杂碎、碗坨、抿节、钱饭饭等地方风味小吃，共同凝练出古城源远流长的文明史诗，让人忘返。

眉山归来读东坡

□ 李勇鸿

1069年，王安石推行变法，苏轼因觉得变法措施过于激进而表示反对，受到王安石的排挤，随后被外放。从此，苏轼远离了京城政治中心，先后前往杭州、密州、徐州任职。这一路虽然历尽艰辛，但他一心为民，走到哪里都为当地老百姓办实事、办好事，深受百姓喜欢和拥护。其间，他还创作出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“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名句。

1079年，一场“乌台诗案”让苏轼琅珰入狱，险些性命不保。经过多方营救，苏轼在狱中度过103天后终于获释，最终从轻发落，被贬至黄州。当时，苏轼44岁，正值中年，却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。他黯然写下“寂寞沙洲冷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。可是，苏轼一边跌倒、一边治愈，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对生活的无限激情。

初到黄州，因戴罪之身，苏轼没有俸禄，也没有足够的粮食，他只好求助当地知州，知州答应将东面山坡上一片荒地给他耕种。于是，苏轼带着一家人开荒种地，还自制了“东坡肉”，动手修建农舍，享受田园生活。几年里，人生这艘跌宕起伏的船，载着苏轼尝尽了世间冷暖，也磨炼出了坚强的意志，让他更加热爱生活，变得乐观豁达，活得恣意潇洒。此时，苏轼才真正把自己活成了苏东坡。正如他笔下所写：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同时，在文学创作方面，苏轼也迎来了井喷时期。他的前后《赤壁赋》等作品，充分彰显了他豪迈宽广的胸怀、坦荡的人格魅力，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

□ 徐新

志返，世间也变得充实而丰盈。

四月，人们不负春光，争先恐后地奔向大自然的怀抱。风光秀丽、风轻水暖、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，乍暖还寒的天气已经过去，大地呈现出春和景明之象，正是人间春浓时，也是一个远足踏青、亲近自然的好时节。诗经有云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早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宋人吴惟信《苏堤清明即事》生动地描绘出人们郊游踏春，惬意地融入大自然，直至日暮方归的画卷。人们趋赶阳高照、春色融融、花事正繁，或陪伴家人，或邀几个好友，躲开冗杂俗事，去郊外踏青，给心灵放假。徜徉山水间，行走阡陌中，享受花的芬芳，聆听虫吟鸟鸣，观赏绿水青山，追逐蓝天白云，以最亲密的姿态亲近大自然，体味生活的轻松与快乐，任欢歌笑语在天地间随意流淌，让生命彻底融入那美好的春天里。

四月，寄托着人们一种特殊的情结。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”，在这风清景明时，总能勾起人们对往事的追怀、怀念以及悲欢离合浸染的乡思情结。人们自然会想起杜牧的《清明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世间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一场久别重逢。这人间四月天，沉浸在

悦读书吧

乱世中的学术星光

——读《荒野上的大师》有感

□ 聂顺荣

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，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。然而，就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学术荒野之上，一群大师却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，开辟出中国考古学的崭新天地。《荒野上的大师》一书，如同一个时光宝盒，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以及大师们的传奇故事生动呈现。

该书以地质调查所、清华国学研究院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的发展为主线，精心勾勒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宏大篇章。李济，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，在考古事业尚处萌芽之时，便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投身其中。他深知考古工作对于重建中国远古历史的重大意义，在殷墟等考古现场，如一位执着的探索者，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，用汗水和智慧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。他的坚持与专注，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伉俪，无疑是书中令人瞩目的存在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他们将个人安危抛诸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之中。梁思成凭借深厚的专业功底，精确测绘古建筑，让那些古老建筑的线条与结构在图纸上重现生机；林徽因则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和渊博的文化底蕴，从美学与文化的角度赋予了古建筑新的灵魂。他们在山西的古寺庙里，不惧严寒酷暑，攀爬在摇摇欲坠的架梁之上，只为记录下每一处珍贵的建筑细节。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为守护中国建筑文化的瑰宝四处奔走，他们的故事是爱情与理想完美融合的典范。

书中还讲述了赵元任、裴文中等、夏鼐、丁文江等众多大师的事迹。作为语言学大师，赵元任以跨学科的视野开辟多维度考古研究新路，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，他不仅在语言领域

有着开创性的贡献，还将语言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，为解读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。裴文中等在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，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的毅力，历经无数次挖掘与探索，终于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，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世界，让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夏鼐在考古学诸多领域成就斐然，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考古学理论的深入研究，为中国考古学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丁文江被誉为“中国地质学之父”，他在地质调查和研究中，不畏艰难险阻，深入偏远地区开展实地考察，为地质学发展鞠躬尽瘁。

这些大师身处战火纷飞、物质匮乏、信息闭塞的困境，不仅要直面生存的挑战，还要承受外界的质疑与误解，但他们从未动摇过对学术的热爱和对国家的责任。

他们在“荒野”上迈出的每一步，都饱含着对未知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；他们的每一次坚持，都彰显出面对西方偏见时坚定的爱国情怀、困境中勇往直前的无畏勇气、追求真理时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，以及学者间携手共进的团队意识。他们以热血和专业，在荒芜的学术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，让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得以重新被世界认识。

《荒野上的大师》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考古学发展的书籍，更是一部记录大师们精神风貌的史诗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乱世之中真正的大师们如何坚守理想，如何以一己之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。身处当今和平与繁荣的时代，我们更应铭记这些大师的风骨与情怀，传承他们伟大的精神，在各自的领域中坚守对真理的追寻，不断探索创新，让大师们的精神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诗话节气

“柳节”清明

□ 钟芳

都对柳之根、皮、枝、叶的医用价值均有记载。古人认为，柳枝能够降除瘟疫。于是清明时节，便有了“插柳于门外，以辟不祥”“插柳条于明堂，驱虫、辟邪、佑护一家平安”的做法。

清明柳俗，在唐宋时期已十分盛行。祭祀完毕，人们不仅在门前插柳枝，而且还在头上戴个柳条帽圈，坐着插满柳条的车子、轿子踏青游玩。唐代段成式所著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：“唐中宗三月初三日，赐侍臣细柳圈，言带之可免蚕毒。”《新唐书·李适传》也记载“细柳圈辟邪”。清明节把柳条挽成圈环分赠群臣以祝贺驱邪之习。到唐末黄巢起义的时候，还规定以清明为期限，以戴柳为信号，乃取柳树生机勃勃、容易成功之寓意。

“忽见家家插杨柳，始知今日是清明。”宋朝陆游送句诗流传甚广，诗人一看到家家门口插柳条了，便知道清明节到了。宋代吕明明的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：“今人寒食节，家家折柳插门上，唯江淮之间尤胜，无一家不插者。”有的地方还用面和米做成飞燕状的食品，串在柳条上，然后插到门上，称作“子推燕”。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记载：“清明交三月，节前两日谓之寒食，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，便是此日，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，名曰明眼。凡官民不论大小家，子女未冠笄者，以此日上头。”在这里，戴柳还作为成年的标志。据此，后世便有“纪年华”之遗俗，并演化成妇女戴柳球于鬓边祈求红颜永驻的习俗。这是以戴柳来显现出对青春年华的珍惜与留恋，又赋予春柳更美好的意象。

明清时期。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，男女戴柳之俗蔚然成风。明朝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覧志余》中写道：“家家插柳满檐，青茜可爱，男女或戴之。”清代杨慎华的《插柳枝》诗：“清明一霎又今朝，听得沿街卖柳条。相约比邻诸姊妹，一枝斜插绿云翘。”描述的都是当时清明节民间插柳条的习俗。祭祀完毕，人们常常要折些柳枝将供品串起来，沐浴着春光，有的人还会把柳条编成花环状戴在头上，踏青郊游、歌舞欢度。

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，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，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，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，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，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，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，以传承红色

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，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，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，凸显地域特色，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，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优稿优酬。

投稿邮箱：
gejiedb2002@126.com
联系电话：029-63903884
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